

历史性介入、制度化约束与多面向拓展

——中国新闻业务研究百年回顾与思考

强月新 刘莲莲

摘要:文章从环境性因素、新闻实践、学科规律三个维度对一百多年来我国的新闻业务研究状况和研究趋势进行描述,试图探寻影响新闻业务研究演变的内在规律。我国新闻业务研究初期是出于救亡图存的需要而在“中体西用”的框架下实现历史性介入,并经历了从早期的体验式阐释到1918年之后的经验性概括的转变。1949年后,我国新闻业务研究延续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新闻实践理念,并逐步走上制度化的发展道路,呈现出高度政治化态势,这种现象在“文革”期间达到了极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新闻业务研究在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并逐步完善等宏观背景的影响下,伴随着新闻本位的回归,逐渐呈现出专业化和学理化并行的发展态势,进入多面向拓展阶段。

关键词:新闻业务研究;演变;实践反思;专业化;学理化

中图分类号:G210;G2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5443(2018)01-0098-11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17JJD860003)、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7CXW021)、安徽省社科规划项目(AHSKY2016D79)

理论、业务和历史共同构成了新闻学研究的三个层面。李良荣认为,新闻业务研究的任务是“总结、研究各种新闻业务知识和新闻工作的技能技巧,包括新闻采访、新闻写作、新闻编辑、新闻摄影、报刊发行等”^[1]。新闻业务一般包括采、写、编、播、评等诸项与新闻产制环节相关的实践活动。由此,新闻业务研究关注的是研究主体对新闻产制实践的分析、解释和探索。新闻业务研究发展与演变的方向大致受到如下三方面因素的影响:其一,新闻业务的发展状况。新闻业务的发展状况是新闻业务研究的基础,新闻业务研究的对象是具体而细微的新闻产制实践,一旦后者发生变化,前者也必然随之进行调整。其二,新闻业务研究的一般规律。新闻业务研究的一般规律是新闻业务研究发展的内在因素,作为新闻学研究体系的一个支系,新闻业务研究也遵循学科发展的一般规律,有其学科发展的自身逻辑。新闻业务研究因与新闻产制实践之间的关系尤其密切,其形成需要两个基本条件:一是一定的经验累积,即经验事实或社会现象积累到一定程度后要求建立新的学科对这些事实或现象进行解释和分析;二是学科基本知识的积淀,即来自其他学科或所属学科研究过程中相关知识的积累从而使得一门新的学科的出现成为必然。与其他学科的发展一样,新闻业务研究也遵循着从经验到学理、从表层到里层、从学科整体阐释到专业领域探讨这一普遍规律。其三,新闻业务研究的整体环境。政治、经济和文化三种因素共同构成了新闻业务研究的整体环境,这决定着新闻业务研究的价值立场选择、理论资源使用、研究方法应用等。在这些因素中,新闻业务与政治之间的密切联系使得政治因素成为影响新闻业务研究最主要的因素。从实然的角度来看,新闻业务是在一定时代背景下所进行的新闻实践,针对它的研究离不开研究者对特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的认知和把握;从应然的角度而言,理想中的新闻业务应当如何,这是研究者在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中所做出的价值判断。当然,这两个方面并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共同融入研究者的研究过程中,表现为研究者立足现实实践探寻理想状态的价值追求,或从理想出发审视新闻业务实践。可以说,实

践逻辑、政治逻辑、学理逻辑在新闻业务的发展过程中,或明或暗地交织在一起,共同推动着新闻业务研究的发展和演变。

笔者立足于新闻业务研究内容的梳理,从研究环境的变化、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三个方面探究我国新闻业务研究一百余年来的发展状况,重点从环境性因素、新闻产制实践、学科规律三个维度描述新闻业务研究并解释新闻业务研究何以如此,以期探寻出新闻业务研究变迁的路径和规律,并在此基础上讨论现有研究的特点,展望新闻业务研究下一步发展和演变的可能性。由于地区间新闻业务理念和实践存在较大差异,因而,本文仅限于讨论大陆地区出版发行的新闻业务研究领域的专著和学术期刊论文等,不涉及港澳台地区新闻业务研究的成果。

在分期问题上,现有新闻传播思想史、新闻学术史、新闻理论研究等通常将1918年新闻学研究的建立、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78年改革开放、199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建立四个具有转折意义的年份作为分期的时间节点,进而将研究阶段分为五个时期。这一划分方法较为细致,结合对新闻业务研究成果的梳理与分析,我们认为,这样的划分方法在某些层面上难以反映出不同时期新闻业务研究成果之间的内在联系,因此,本文采用更为宽泛的三个阶段的分期方法,试图呈现同一研究主题的延续性和变化的内在逻辑:从鸦片战争到1948年为新闻业务研究的起步阶段;1949年至1977年为新闻业务的制度化阶段;1978年至今为新闻业务研究的本位回归和多面向拓展阶段。

一、历史性介入:新闻业务研究的体验式阐释与经验性概括

从鸦片战争到1948年,中国新闻学完成了从新闻理念启蒙到新闻学学科化的转变。这一转变主要是随着社会政治环境的变化以及民族国家独立的历史使命发生的。相应地,这一时期新闻业务的研究也经历了从早期的体验式阐释到此后的经验性总结的转变。

晚清以来,特别是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强行打开了大清的国门,昔日蛮夷的强大震撼了国人,一部分较早觉醒的仁人志士开始进行艰辛的探索,走上了自强图存之路。在这种背景下,中西对比成为这一时期有识之士认知世界的框架,“师夷长技以制夷”和“中体西用”等观念即是其代表。这一时期的新闻业务并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研究,更多的是对作为中西文化交流一个面向的新闻实践观念的阐释:一方面,传教士的办报活动输入了西方的办报观念,并在对中国传统的“报纸”(如《京报》)进行分析和评价的基础上,将中国传统文学作品中的词汇、句式(如章回体小说的写法)引入新闻报道中;另一方面,传统社会的士大夫阶层以匡扶时世为己任,在报纸上发表救亡图存方略。他们身上带着中国士大夫的传统印记以及现代知识分子精神,进而形成了所谓的“文人论政”风格^[1]。他们结合对传教士办报活动的观察以及自身的海外游学经历,在中西比较的视野下讨论报纸在社会改良中的作用,代表性的作品有《论日报渐行于中土》(王韬)、《报馆有益于国事》(梁启超)、《敬告我同业诸君》(梁启超)以及《日报》(郑观应)等。在他们看来,办报并不是一种职业,而是一种表达其政治主张、推行社会变革的手段。因此,他们重点讨论的是报馆或新闻纸之于社会的重要性,对新闻业务方面的讨论较少,多是在办报实践过程中出于服务论政需要偶尔提及。

“中体西用”的框架体现在有识之士对西方报纸社会功能的体察并将之与传统相附会从而成为认识报纸、寻求办报活动正当性的依据,如谭嗣同引用曹丕《典论·论文》中关于“文章”功能的论述来描述报纸的功能:“信乎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斯事体大,未有如报章之一备哉灿烂者也”^[2]。康有为的《开设报馆议》^[3]在描述西方社会报纸的功能的同时,将之与中国古代的采诗活动进行了类比:“盖诗者,即今之新报”,“泰西能用吾采诗之法以致富强,吾不能推吾采诗之法、邸报之法而致愚弱,甚非计也”。“内-外”和“上-下”成为报纸“去塞求通”功能的两大维度,前者乃就救亡图存的外部环境而言,后者则是救亡图存的内部着力点,体现在梁启超和吴恒炜的“万民之喉舌”^[4]、王韬的“民隐得以上达”、严复的“开民智”等表述中,“民”由此成为办报活动的主要对象。

报纸是“文人论政”的阵地,而对“民”的重视则是“文人论政”的基调,这两个方面的结合使得评论写

作及报章的文体风格成为这一时期新闻业务讨论的焦点议题。在评论的写作上,梁启超提出了公(“不偏徇一党之意见”)、要(讨论一国一群的大问题)、周(“务献刍蕘,以助达识”)、适(与社会接受程度相适宜)四大方针^[6]。在此精神下,《时报》开创了配合当天新闻的短评,有别于长篇评论。严复提出要根据不同的对象开办不同类型报纸的主张^[7],谭嗣同提出了“民史”“民口”的观念^[8],认为报章文体可分为“三类十体”^[9],应做到骈散合一、半文半白。晚清时期主导散文风格的主要是“桐城派”余绪,文风较为刻板。王韬则一反此风,将是否直抒胸臆、通俗易懂视为判断文章优劣的标准,“文章所贵,在乎纪事述情,自抒胸臆,俾人人知其命意之所在,而一如我怀之所欲吐,斯即佳文”^[9]。梁启超在《时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等报纸上所刊发的文章,以宣传变法、议论政事为主,时人称为“报章体”或“新文体”。梁启超后来自己总结了这一文风的特点:“自是启超复专以宣传为业,为《新民丛报》《新小说》等诸杂志,畅其旨义,国人竞喜读之,清廷虽严禁不能遏……启超夙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为文,学晚汉、魏晋,颇尚矜炼,至是自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竞效之,号‘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然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10]在报道的内容上,办报者认为《京报》仅涉及朝廷事务,报道面太窄,“但传朝廷之政事,不录闾里之琐屑”^[11],而报纸应当兼顾“朝野之新闻”,并规定了办报的一般原则和伦理原则,如《万国公报》确立了“厚道”“直道”等伦理原则;《大公报》确立了“忘己之为大无私,之谓公”的原则;梁启超认为报纸应当做到“宗旨定而高”“思想新而正”“材料富而正”“报事确而速”^[12];郑贯公则进一步提出了办报人应在道德、调查、翻译、文字风格、编辑、校对、广告等方面遵循“报律”^[12]。

这一阶段的新闻从业者(包括办报者)多数是传统文人,他们对办报原则以及新闻从业者的要求带有显著的文人意识。“无论西化程度多深,这些人的身上洗刷不掉儒家士大夫的熏陶,连反儒家反传统者(如鲁迅)的道德承担也有浓厚的儒家痕迹。”^[12]王韬对主笔的要求是德才兼备,就德的方面来说,“其居心务期诚正”,并以德为评判主笔的品级^[12]。《申报》要求新闻从业者“才学兼全”,以达到“见闻较确”“巨细皆书”的目的^[13]。梁启超也提出新闻从业人员应该具有“五本”“八德”^[14]。从这些表述来看,衡量新闻从业者素质的标准,混杂了传统文人和新闻专业人才两种不同的标准。

此时的新闻业务研究实质上只是文人的体验式阐释。之所以说是“体验”,主要原因在于他们对新闻业务的研究是在对西方报纸的实际观察基础上为宣传变法、改良等诉求而提出来的一些主张。政论这一表达意见的体裁在1912年袁世凯加强对报界的控制后受到了较大的限制。这就促使报纸把运营的重心转向了新闻报道上,这一转变为新闻业务的探索和总结积累了丰厚的经验。相对于梁启超提出的“八德”,黄远生提出的“四能”更加强调从业者自身的专业素养:“脑筋能想”“腿脚能奔走”“耳能听”“手能写”^[15]。

正如蔡元培指出的那样,欧美各国新闻学的建立与其新闻界经验的积累有着必然联系,“凡一科学之成立,必先有事实,然后有学理。以无事实则无经验可言;无经验,则学理亦无由发生”^[16]。学界现在公认我国新闻学建立的标志是徐宝璜《新闻学》(1919年)的出版。我国新闻学的建立一方面与此前的新闻实践所积累的经验有关,如梁启超认为,1912年的时候“报馆之发达,一日千里,即以京师论,已逾百家……崇论闳议,家喻户晓”^[17];另一方面也与国外新闻学著作的翻译引介(松平君本的《新闻学》和休曼的《实用新闻学》)有着必然的联系。邵飘萍1924年总结说,“有时每觉行之而有所未安焉,乃稍稍从事于所学,以与平时之经验相商榷。至第二次亡命赴东之日,始贻吾人以绝好机会,得涉猎一二世界新闻学者所著之书,尤喜与平时之经验理想有常合之处。”^[18]徐宝璜的《新闻学》尽管更多的是从本体的角度对新闻学研究的基本范畴进行了体系化建构,但书中除了新闻学研究的一般范畴之外,还包括了“新闻之采集”“新闻之编辑”“新闻之题目”等与新闻业务直接相关的内容,其中讨论的新闻理论的其他范畴(如新闻价值的判定标准等)对于新闻业务的实际操作也有着相当的启发^[19]。这一时期新闻业务研究体系化、专门化的标志是任白涛的《应用新闻学》(1922年)、邵飘萍的《实际应用新闻学》(1923年)和周孝庵的《最新实验新闻学》(1928年)等著作的出版。《应用新闻学》包括总论、采访、写作和编辑四个部分^[20],《最新实验新闻学》由陈布雷作序,包括新闻采访、新闻编辑和新闻标题三个部分^[21]。从体例上看,两本书基本包括了新闻业务研

究的基本层面,具有体系化特征。《实际应用新闻学》是专门讨论新闻采访的著作,用邵飘萍的话来说就是具体说明“新闻材料采集法”^[22]。该书涉及新闻从业者的职业道德、新闻敏感与新闻价值判定之间的关系、根据采访对象的心理反应确立不同的采访策略等方面的内容,这是新闻业务研究专门化的体现。在此后的发展中,新闻业务研究基本遵循着从经验到概括分析的路径,以包括采、写、编为基本内容的体系化研究和以单一新闻产制环节为核心的专门化研究为基本的框架,奠定了后续新闻业务研究的基调。随着抗战的爆发,“战时新闻学”成为了新闻业务研究的重点,任白涛、张友鸾、田玉振等人均围绕其进行了探讨。

此外,伴随着早期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引介以及之后革命斗争的需要,中国共产党人对自身的新闻实践活动进行了阐释,逐渐形成了新闻理论体系和新闻实践观念。这主要体现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以来所建立和逐步完善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代表作品包括李大钊的《在北大新闻记者同志会成立会上的演说》(1922年)、张友渔的《新闻之理论与现象》(1936年)、陆定一的《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1943年)、毛泽东的《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1948年)以及刘少奇的《对华北记者团的谈话》等。这些新闻思想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理论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整体上看,这一阶段新闻业务研究是伴随着报纸作为“文人论政”的工具而进入中国近代历史当中的,并从以感性思考和以感情说服为方式的体验式阐释逐渐演变为20世纪20年代前后的经验总结式概括。这一时期新闻学研究中业务经验的概括与基本理论的描述之间并没有泾渭分明的界限。理论与业务研究的混杂性一直存在于此后的理论和业务研究中,代表性作品有黄天鹏的《新闻学概论》、任毕明的《战时新闻学》、萨空了的《科学的新闻学概论》、储玉坤的《现代新闻学》、田玉振的《战时新闻工作的途径》及谢六逸的《通讯练习》等。正如有学者概括的那样,“在近代中国,没有一本纯粹的理论新闻学著作,新闻学著作基本上都是将基本理论的阐释与新闻业务经验的介绍融为一体”^[23]。

二、新闻业务研究的制度化约束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到1976年“文革”结束,我国的新闻事业逐渐被改造成社会主义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政治因素开始成为新闻事业发展和新闻业务研究的主导性因素,这种主导性因素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到“文革”之前表现为对新闻业务研究的制度化约束。“文革”期间,新闻业务研究则完全被政治因素所主导,制度化约束演化成政治化主宰。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伴随着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确立,中国开始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新闻学研究被纳入到制度化建设的道路上来。20世纪50年代初到文革之前这一时期,新闻业务的实践与研究逐渐被纳入社会主义建设轨道,成为社会主义新闻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制度化一方面使得社会主义新闻理论体系得以完善,另一方面也使得新闻业务研究受到了制约。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经济力量薄弱,新闻界出现了以节约成本为主要诉求的市场化讨论,提出了报纸的市场化发展构想,强调市场、受众和报纸的商品属性等,但这与国家推行的计划经济相悖,因此,市场化并未得到深入讨论。整体言之,这一时期的新闻业务研究制度化主要与以下三方面因素有着密切关联:首先,对旧中国新闻事业的接收和对新闻从业人员观念的改造成为新闻学研究(包括新闻业务研究)制度化的现实基础。如何对新闻实践理念和新闻从业人员的观念进行改造,成为这一时期新闻业务研究的重要内容。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由于社会主义建设面临着重重困难和巨大挑战,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发展均实行严苛的计划,这一以国家主导为核心的体制对新闻事业、新闻业务研究的发展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第三,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战时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对苏联新闻管理体制的借鉴,成为新闻业务研究制度化制约比较直接的动因。

研究的制度化具体表现为在计划安排下新闻业务研究的统一化,主要方式是在国家统一号召和动员之下,对新闻业务的具体原则、方针和任务的阐释。这一时期新闻业务研究突出新闻研究的政治性趋向,很大程度上忽视了新闻业务研究自身的规律性,尤其未注意到新闻业务自身区别于党报业务的特殊性。

这一时期绝大部分关于新闻业务原则、观念的阐释基本处于国家的主导之下。从1950年4月《人民

日报》发表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提出的“引导人民群众在报纸刊物上公开地批评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的观点,到1954年7月《中共中央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议》对“社论”的重视,再到1956年7月《人民日报》摒弃苏联《真理报》模式,实施以“扩大报道范围,多发新闻”“开展自由讨论,阐发社会言论”“改进文风,活跃空气”为主旨的改版,以及1957年4月此次改版的中止,这些变化或改版的方向均是在国家意志的要求下进行的,这使得新闻业务的研究不再只是一个遵循自身学科规律的研究,更多的是一个国家对新闻业务的看法的表达。其中值得注意的是邓拓在《关于报纸的社论》一文中对于报纸社论的对象、立场、写作等诸环节的阐释^[24]。

新闻业务阐释空间的大小有赖于国家指令与新闻业务自身规律之间相符合的程度。当两者相冲突的时候,新闻业务的阐释空间缩小,反之,新闻业务的阐释空间变大。穆青正是在后一种情况下提出了“应该增加一些报道问题的新闻”的观点:“在报道中能够及时地提出问题,揭示矛盾,本身就是一种有力的批评。这种批评是客观的,就事论事的,也是最适合新闻报道所采取的一种批评方法”。^[25]同时,穆青还对新闻采访和写作过程中应重视客观事实、抓住新鲜事物、重视小新闻和注意“兴趣”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阐释^[25]。

在国家指令下,晚报的生存遭遇着严峻的挑战,其新闻业务徘徊在“跟着党报的调子、还是用自己的语言讲话好”^[26]这一困境中。在此情况下,赵超构于1956年提出了“短”“广”“软”^[26]的办报思路,试图调和两者之间的矛盾,“所有的报纸都应该宣传党的政策,都应该宣传社会主义,都应该具有指导性……我们需要高尚的情操,需要愉快的休息,需要健康无害的趣味,需要丰富多彩的社会主义文化生活”^[27]。

“文革”期间,我国进入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时期,新闻事业完全服从于国家意志,新闻业务研究也开始进入了制度化主宰时期。1966年开始,国家意志全面主导了新闻业务的阐释工作,新闻业务研究受到了严格的限制,“不是单纯地介绍新闻业务知识、采访方法和写作技巧,而主要是为了……帮助读者更好地掌握新闻报道这一阶级斗争的锐利武器,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28],这一阶级斗争立场在全国各高校的新闻业务教材中均有体现。在阶级斗争立场具有压倒性优势的形势下,恽逸群的《论新八股》(1973年)一文对此做出了批判。这一时期的新闻业务研究成果主要有蓝鸿文的《专业采访报道学》、邱沛篁的《新闻采访艺术》等,有参考价值的成果并不多。

在这一阶段,出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政治因素成为我国新闻事业发展的支配性因素。政治因素通过对新闻实践的渗透以及对学理逻辑的约束,最后成为支配新闻业务研究的主要力量。因此,这一阶段的新闻业务研究整体上处于制度化约束的境遇中。

三、多面向拓展:新闻业务研究的专业化和学理化

1978年以来,我国新闻业务研究在对实践进行反思的基础上开始回归新闻本位,加之此后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这一回归本位的趋势进一步加快,新闻业务研究自身规律得到了尊重。伴随着国外理论成果和研究方法的引入,新闻业务研究逐渐呈现出专业化和学理化的发展势头。尽管实践经验总结和思辨性研究依旧是这一阶段新闻业务研究的主流,但我国新闻业务研究总体上进入了多面向拓展阶段。

1978年,“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观念的提出以及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使得我国整个社会呈现出开放的状态,新闻界围绕着新闻与政治、新闻与宣传、党性与人民性等话题进行了讨论,并形成了基本共识,摆脱了“左”的思想对新闻业务研究的禁锢。1981年,中央提出的“真”“短”“快”“活”“强”^[29]成为改进新闻工作的主导方向。随着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新闻如何为经济建设服务也成为新闻研究者必须加以讨论的话题。随后,新闻学研究出现了关于新闻商品性、新闻价值的讨论。表面上看,这些讨论似乎属于新闻理论研究的范畴,但它们实际上或多或少代表了整个新闻界对新闻学领域(包括新闻业务)一些核心问题的关注。范敬宜就是通过思索宣传与新闻的关系而提出了新闻报道的“三贴近”方针,即“同中央精神贴得近些再近些,同实际工作贴得近些再近些,同群众脉搏贴得近些再近些”^[30]。“三贴近”方针实际上是在寻求宣传与新闻之间的联结点。正是通过这一时期所展开的几次大讨论,研究者才真正形成了对

1949—1977年间新闻学研究的反思,而反思所形成的共识也使得新闻学研究逐渐走上正轨,并与国家经济、社会、文化发展产生了密切的联系,此后,包括新闻业务研究在内的新闻学研究开始走上以发展为主旨的“回归新闻本位”的道路。可以说,“新闻本位”成为1978年之后中国新闻业务研究的基本旨趣,这体现在研究者开始从新闻业务本身的实际状况出发,重点讨论新闻产制实践的总体规律以及不同产制流程应当遵循的基本规律。

1992年,中央提出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市场因素开始影响着新闻业的发展,市场化改革使得市场成为影响新闻产制环节的重要因素。由此,国家、市场、媒体构成了新闻业务研究的基本框架。同时,新闻业务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得到了较快的发展,随着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的出现,新闻业务开始呈现出与传统媒体时代不同的新实践和新现象。这些变化促使新闻业务研究呈现出专业化趋势,具体体现在两方面:一是经验总结性研究依旧是新闻业务研究的主流,但在经验总结的对象上越来越细化,既包括了对采、写、编等诸环节更为深入和细致的分析,也包括了一些对新闻业务新实践和新现象的讨论,如深度报道、精确报道、网络新闻等。二是随着国内外学术界理论沟通的深入、对话的加强,国外相关新闻传播理论和方法在我国新闻业务研究领域的应用更加深入,最终,新闻业务研究的跨学科研究成果不断涌现。

(一)研究视野的拓展

在新闻业务研究反思的过程中,其他学科的理论资源被作为了一种促进反思的极佳手段,新闻业务研究开始迈上了交叉研究的道路。在这些研究中,最具代表性的成果是艾丰关于新闻采访方法论的探索。在1982年出版的《新闻采访方法论》^[31]一书中,艾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从方法论的角度讨论了新闻采访中存在的矛盾、普遍规律以及我国新闻采访的特殊规律,全书主要内容包括采访与事实、记者和采访对象、基本采访方法等。艾丰认为,采访不仅需要感性、程序性以及局部规律的了解,更为重要的是要有对理性、规律性、全面性的了解,并且要注重把握新闻手段的普遍规律和特殊规律。由此,艾丰打破了“报纸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这一僵化的新闻观念。延续这一研究思路,艾丰于1993年出版了《新闻写作方法论》一书。

借用其他学科的理论来反思新闻业务研究这一现象还体现在社会学、心理学、伦理学等学科理论在新闻业务研究中的运用。从稍早的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到后来的心理学、社会学、伦理学,这些理论成果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迅速被引进到国内。这些新理论或新研究成果的引入在新闻学领域形成了学科交叉的研究,如心理学在新闻学研究中的运用最早开始于徐宝璜的《新闻学》对采访心理和受众心理的探讨,此后邵飘萍、袁殊、任白涛等也曾对此进行了讨论^[32]。但在1949—1977年间,新闻业务的心理学研究处于停滞状态。到1978年之后,心理学在新闻业务研究中重新兴起,代表作有张骏德和刘海贵的《新闻心理学》(1986年)、徐培汀和谭启泰的《新闻心理学漫谈》等。然而,这些研究始终还停留在新闻学与心理学的交叉研究方面,尚未对具体的新闻心理机制进行探讨。社会学和伦理学同样也被引入到新闻业务研究中,但对西方新学科、新理论的使用仅仅停留在引介和“勉强撮合”阶段,即借用其他学科的概念来解释新闻业务现象,未出现有深度的新闻业务研究成果。

经过1978—1991年间的引介和普及,1992年以来新闻业务研究在采用文学、心理学、社会学、伦理学等交叉学科理论时更加成熟。语言学、叙事学等学术理论和方法进入新闻业务研究后,出现了新闻语言学、新闻符号学和新闻叙事学等交叉研究成果,如曾庆香、何纯借用话语分析、文学叙事学理论框架,分别出版了《新闻叙事学》(2005年)、《新闻叙事学》(2006年),并发表了若干的相关论文。语言学方面,新闻语言学专著则有李元授和白丁的《新闻语言学》(2001年)、高小方的《新闻语言学》(2012年)、黄匡宇的《电视新闻语言学》(2000年)、李玮的《新闻符号学》(2014年)以及刘智的《新闻文化与符号》(1999年)等。

伴随市场化而出现的有偿新闻、隐性广告、新闻寻租等现象也开始成为新闻业务研究的关注焦点^{[33][34][35]},并被纳入了新闻道德伦理范畴加以讨论^[36],代表性著作包括黄瑚的《新闻法规与新闻职业道德》(1998年)、陈桂兰的《新闻职业道德教程》(1997年)以及徐新平的《新闻伦理学新论》(2001年)等。新闻心理学

领域的研究也更加细化和深入,既有采访心理学、写作心理学和编辑心理学等分门别类的研究,也有如获取信息的心理、读者的自主性心理、参与性心理等方面的细致研究。截至1994年,我国共有新闻心理学专著14本,论文集2本^[37]。

新闻本质上是社会活动,对这一活动的研究很难局限在新闻学的学科视野内完成,新闻业务研究从早期对新闻采访、写作、编辑、评论等不同产制环节的概括和梳理逐渐转变到对“新闻生产”或“新闻产制”活动的分析。在这里,新闻业务研究不再明确区分各环节的相对独立性,而是将其纳入整体新闻产制环节中进行考量,这与西方社会学研究以及新闻社会学研究视野的引入有着较大关系。张志安借用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对新闻编辑部中的新闻生产进行了讨论^[38],并展现了新闻生产与新闻控制之间所存在的张力问题^[39];洪兵则讨论转型社会中新闻生产的变迁问题^[40]。此外,知识社会学、社会记忆、情感社会学、职业意识等也是新闻生产研究的重要内容。

随着社会学、心理学等理论在新闻业务研究中的应用,这些学科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也随之被运用到新闻业务研究中,如实证方法逐渐成为新生代研究者主要采用的研究方法。截至目前,量化研究以及以民族志、深度访谈为代表的质化研究被研究者奉为圭臬,如常见的对农民形象、工人形象、农民工形象的框架研究采用的是内容分析法,对新闻编辑室内新闻产制环节的分析则多采用了深度访谈法。

(二)研究领域的细分

随着高等教育逐步走上正轨,新闻学教育开始迅速发展,这刺激了对新闻业务相关教材和著作的需求。据统计,1979-1992年间,仅出版的新闻业务方面的书籍大约有1200种之多^[41],其中有代表性的著作或教材有:安岗的《新闻论集》、胡绩伟的《新闻工作论说集》、林帆的《新闻写作纵横谈》、李良荣的《中国报纸文体发展概要》、邝妙云的《新闻写作教程》、洪天国的《现代新闻写作技巧》、刘海贵和尹德刚等的《新闻采访新编》、刘文峰主编的《编辑学》(1988年)、彭朝丞的《现代新闻标题学》(1989年)、陆炳麟的《怎样当编辑》、姚文华的《实用新闻评论学》(1985年)以及丁法章的《新闻评论学》(1985年)等。由于1949-1977年间新闻业务研究的停滞,加上新闻专业研究人才稀缺,新闻业务的研究成果较之前变化不大,缺乏有分量的学理性专著。1992年,新闻学教育进入专业化培养阶段,这极大加快了新闻业务研究的进程,全国有52所高校设立了新闻专业类教学点,共77个新闻学类专业,其中包括39个新闻学专业,9个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42]。一大批关于新闻采访、新闻写作、新闻编辑的教材纷纷出版,蔡雯的《现代新闻编辑学》(1995年)、张子让的《当代新闻编辑》(1999年)、范敬宜的《总编辑手记》(1997年)等皆是其中的典范。随着新媒体的出现,网络新闻业务研究方面的专著和教材也频频出版,代表性的有杜骏飞的《网络新闻学》(2001年)、彭兰的《网络新闻学原理与应用》(2003年)、仲志远的《网络新闻学》(2002年)、金梦玉的《网络新闻实务》(2001年)、廖卫民和赵民的《互联网媒体与网络新闻业务》(2002年)以及蒋晓丽的《网络新闻编辑学》(2012年)等。

研究领域的细分不仅体现在对采、写、编等产制流程的研究更加细致,还体现在对诸如深度报道、民生新闻等新的报道样式的讨论上。

深度报道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深度报道兴起初期,学界对深度报道的研究更多体现在报道形式的争论、报道技巧的阐释以及电视媒介进行深度报道的可能性等方面,这些研究停留在经验层面的总结上,未上升到理性的分析和研究上。关于批评性报道的研究情况与深度报道情况相似。随着深度报道实践经验的积累,1992年之后深度报道的研究更加注重学理性,并重视新的媒介环境下深度报道存在形态的研究,同时,深度报道在我国的起源、原因与发展趋势等也成为研究者关注的焦点。深度报道是对新闻观念、各种新闻文体和媒介角色定位的整合^[43],在从平面媒体到电视媒体的发展过程中,深度报道并不是简单的报道技巧或体裁的电视化移植,更是一种思维方式的转变^{[44][45]}。由于深度报道生产周期相对较长,如何实现深度报道生产速度和深度的共赢,成为新媒体语境下深度报道发展的关键问题^[46]。

另一种新的报道形式民生新闻,产生于20世纪末21世纪初,一般将之视为一种新闻类型或新闻体裁。董天策认为,民生新闻既不是类型也不是体裁,也不只是一种价值取向,“而是题材选择上的民生内

容、报道立场上的平民视角、价值取向上的民本意识、报道方式上的民众话语的有机结合所构成的一种新型新闻传播范式”。^[47]朱寿桐以党的方针、政策等为立论依据,系统性地从民生新闻的“党性原则”和政治倾向性、中国特色与时代特色、历史性、学术可能性等方面对民生新闻的理论进行了考察和建构^[48]。

社会科学方法直接在新闻业务实践中的运用催生了一种新的报道形式——精确新闻的诞生。精确新闻起源于美国,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在我国得到广泛运用和发展。精确新闻的产生与社会学量化研究方法在新闻报道领域中的应用直接相关^[49]。对精确新闻的研究首先集中在对精确新闻的概念、历史、由来、种类、特点等的分析^[50]上。精确新闻的独特性体现在其对社会科学方法(如实验、调查和内容分析等)的使用,满足了人们对客观性和真实性的价值追求。因而,精确新闻的实践及生产流程、数据及调查方法的使用等成为新闻业务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51]。

(三)网络新闻业务研究的兴起

1994年中国接入国际互联网。然而,互联网真正对传统媒体地位形成挑战是在2003年,这一年,互联网成为舆论发起的重要平台。此后,随着3G和4G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对传统媒体形成了冲击。这种冲击主要表现在新媒体对传统媒体新闻产制过程的挑战和影响。互联网使得新闻生产具有了吉登斯意义上的“脱域”特征,即:新闻生产主体和客体的多元化、生产范式的互动化。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模糊了新闻生产者与接受者之间的角色界限,使得两者之间的关系更加复杂,并可能产生“放大的同行争议”“强烈的群体抗议”和“失焦的民众异议”三种类型的争议^[52],造成新闻生产理念和流程的巨大变化。融媒体时代新闻生产流程的再造要求新闻从业者具有全能素质,以适应兼顾报道速度和深度的“钻石模型”^[53]。“众筹新闻”^[54]等新的新闻生产方式也随之应运而生,并受到研究者的关注。更为重要的是,手机、DV等技术为公民参与提供了机会,这可能形成以公民参与、公民报道、公民传播为特征的“公民共享新闻学”^[55]。然而,也有研究表明,在获取信息源、确立新闻生产规则和期待社会认可方面,当前的新闻生产并未脱离传统的新闻生产实践,而是受到了传统新闻生产实践的“结构性制约”^[56]。在传统媒体选择融媒体发展之路后,其新媒体平台编辑部的新闻创新动力主要来自不确定性,然而“编辑部创新既体现出路径依赖也仍然存在着多重可能”^[57]。由此,专业的新闻生产与用户生产两种模式之间可能存在深度融合^[58]。

与新媒体技术发展一道兴起的还有以大数据技术为支撑的数据新闻。对数据新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数据新闻的理念和实践等方面^[59]。就目前来看,大数据技术渗透到了新闻生产的核心环节,重塑了新闻质量标杆,这说明大数据技术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传统的新闻生产模式和机制^[60],并赋予了新闻从业人员以新的角色。大数据新闻主要包括数据驱动的调查性新闻、数据可视化叙事、数据驱动的运用三个创新维度^[61]。但数据新闻也存在数据可能误导传播者和受众、过分依赖数据导致质性分析的缺失、导致报道的模式化和程序化^[62]等问题。更为严重的是,大数据方法在新闻传播创新中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大数据方法与新闻传播价值逻辑之间的矛盾以及大数据的数据源的开放”^[63]。

1978年以来,中国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国策,我国开始转变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道路上来,新闻产制实践也嵌入到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并与之相适应。在这一背景下,新闻业务研究走上了按照自身学科逻辑发展的道路。研究视野的拓展、研究领域的细分、网络新闻业务研究的兴起等方面的变化既体现了学科逻辑也体现了实践逻辑,同时也与这一时期新闻事业的发展与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以及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等宏观背景密切相关。从1978年以来的研究成果看,新闻业务的研究开始呈现出多面向拓展的趋势:既有传统的经验式的总结,又有学理性较强的研究出现;既保持了传统的思辨性研究方法,又借助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赋予新闻业务研究以不同的面向和路径。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1978年以来我国的新闻业务研究是学理逻辑、实践逻辑和政治逻辑相互交织和相互渗透的结果。

四、结语

一百多年来,我国的新闻业务研究大致经历了历史性介入、制度化约束、多面向拓展三个阶段。从总

的趋势来看,我国新闻业务研究已整体形成了内、外两种研究路径。内部路径主要在新闻业务或新闻学体系内讨论新闻的采、写、编等环节;外部路径则是讨论新闻业务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形成了交叉研究的态势。然而,这样的变化并不能掩盖我国新闻业务研究当前存在的诸多问题。

首先,新闻业务研究的学理性尚显不足。一百多年来,新闻业务研究从体验性概括到经验性总结再向学理性分析转变,尤其在多面向拓展阶段,既有经验性总结又有一定的学理性分析。然而,从总体上看,新闻业务研究的经验性总结成果要远远多于学理性分析成果。这种状况的形成既与整体的政治环境有关,也与新闻业务研究自身的特点有关。具体表现在:一是新闻业务实践性较强,难以对之进行抽象研究。二是专业的新闻业务人才稀缺。尽管20世纪90年代新闻类专业人才的培养得到了强化,但作为一个新兴学科,这样的人才储备和供给仍很难满足学理性研究的需要。三是新闻业务实践的各个环节在研究中被人为割裂,导致新闻业务研究各部分之间缺乏关联性,丧失整体感。新闻业务一般包括采、写、编、播、评等诸多环节,而总体性的研究通常以教材的方式存在,更多的是以经验的总结和技巧的描述为目的,且研究者通常也是按照新闻采访、写作、编辑的顺序逐个罗列其观点,这就导致这些环节之间互相割裂,各自为政。如何总结新闻业务的一般性规律,并在新闻产制的整体语境下开展不同产制环节的独立研究,成为提升新闻业务研究水平的重要内容和关键环节。

其次,研究方法多以哲学思辨和朴素的经验归纳为主,价值判断居多,事实判断不足,对量化和质化等研究方法的重视和运用还略显不够。哲学思辨的方法可能会导致研究者忽视事实材料,仅从观点推论到观点,导致研究不接地气,“一个问题是我们的宏观思辨学术传统有时使得我们的研究规范过于‘百花齐放’,致使因为缺乏规范而无法切实提高我们的研究质量”^[64];而朴素的经验归纳则往往执着于“术”的细节,缺乏对实践活动的整体观照,导致研究成为操作技巧的讲解,且重复性成果较多。

其三,简单搬用国外理论和方法,忽视其适用性问题,导致研究的实际意义和价值不大。以国家、市场和媒体这一研究框架为例,相当多的研究直接将“市场”概念搬用到新闻业务研究当中,忽略了中国的“市场”是一个由国家推动、以“发展”为目的市场,并不完全是西方“市场”的概念。在此状况下,忽视中西方市场之间的差别可能会导致我国的新闻业务研究落入西方的理论“套路”中,难以做出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分析,也就无法对我国的新闻产制实践有实际的指导意义。

针对上述问题,笔者认为,就内部研究而言,应当将新闻业务研究作为新闻产制的一个整体过程来加以讨论,然后将其置于新闻理论和新闻史的观照下,考察产制实践与理论概念和历史变迁之间的关系,从中寻找实践与理论、实践与历史之间的矛盾和张力,以形成明确的研究问题,进而展开研究。就外部研究而言,应注重对新闻产制实践的观察和总结,从事实中观察外部力量是如何影响新闻实践的,并将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进一步运用到新闻产制过程的分析中,以勾画出新闻场域与其他场域之间的关系图谱。在这方面,国外的新闻社会学研究以及1992年以来国内学者运用社会学理论和方法讨论新闻产制问题的相关研究做了有益的探索。展望未来,新时代的新闻业务研究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新闻业务研究领域的指导地位,在继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理论的基础上,批判地借鉴国外相关理论成果和研究方法,使之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这是新时代新闻业务研究的基本原则与立场。

参考文献:

- [1] 李良荣.新闻学概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1.
- [2] 李金铨.文人论政:知识分子与报刊.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1;3.
- [3] 谭嗣同.谭嗣同全集.北京:三联书店,1954:119;116-119.
- [4] 康有为.开设报馆议.强学报,1896-01-12.
- [5] 方汉奇,谷长岭,冯迈.近代中国新闻事业史事编年(三).新闻研究资料,1982,1:158-202.
- [6] 梁启超.《时报》发刊例.时报,1904-06-12.
- [7] 严复.严复集:第二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454.

- [8] 李滨.试析谭嗣同的报刊角色观.国际新闻界,2011,6:112-116.
- [9]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1.
- [10]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206.
- [11] 论中国京报异于外国新报.申报,1873-07-18.
- [12] 张之华.中国新闻事业史文选.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40;52-55;7.
- [13] 觅寻报事人.申报,1876-01-22.
- [14] 梁启超.《国风报》叙例//张桐,王忍之.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3卷.北京:三联书店,1977:588-590.
- [15] 黄远生.远生遗著.台北:台湾华文书局,1938:94-103.
- [16] 蔡元培.北大新闻学研究会第一次期满式训词//高平叔.蔡元培全集.北京:中华书局,1984:348.
- [17] 梁启超.鄙人对于言论界之过去及将来//陈书良.梁启超文集.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572.
- [18] 邵飘萍.邵飘萍新闻学论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214.
- [19] 徐宝璜.新闻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
- [20] 任白涛.应用新闻学.上海:三联书店,2014.
- [21] 周孝庵.最新实验新闻学.上海:上海时事新报馆,1928.
- [22] 邵飘萍.实际应用新闻学.上海:上海书店,1989:1.
- [23] 李秀云.中国新闻学术史.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347.
- [24] 邓拓.邓拓全集:第5卷.广州:花城出版社,2002:356-376.
- [25] 穆青.新闻散论.北京:新华出版社,1996:32;61-64.
- [26] 丁法章.办好社会主义晚报之路——谈谈赵超构同志的办报思想.中国记者,1992,4:18-20
- [27] 丁法章.中国晚报界的一面旗帜——写在赵超构百年诞辰之际.新闻记者,2010,5:4-6.
- [28] 《新闻采访与写作》编写组.新闻采访与写作.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1977:2.
- [29] 习仲勋代表中央书记处对新华社的宣传报道提出五点希望//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开创新闻工作的新局面.北京:中国新闻出版社,1985:43.
- [30] 陈崇山.在宣传改革中改革宣传——访《经济日报》总编辑范敬宜.新闻战线,1987,9:5-7.
- [31] 艾丰.新闻采访方法论.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82.
- [32] 邓绍根.新闻心理学在中国研究发展历史的再考察.现代传播,2014,7:34-37.
- [33] 王博.“新闻寻租”何以成为“常规行为”.兰州学刊,2008,12:167-169.
- [34] 王亦高,黄彪文.正确的判断如何得到确认——以“广告新闻”讨论为例.国际新闻界,2007,3:45-49.
- [35] 郑保卫,陈绚.传媒人对“有偿新闻”的看法.新闻记者,2004,5:20-22.
- [36] 马艺,张培.多重价值的融合与冲突.新闻与传播研究,2009,2:94-102.
- [37] 陈力丹.对我国新闻心理学学科建设的几点意见.新闻大学,1995,2:9-11.
- [38] 张志安.编辑部场域中的新闻生产.上海: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
- [39] 张志安.新闻生产与社会控制的张力呈现.新闻与传播评论,2008,165-173.
- [40] 洪兵.转型社会中的新闻生产.上海: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
- [41] 方汉奇.中国新闻传播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492.
- [42] 李建新.中国新闻教育史论.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260.
- [43] 胡翼青.论深度报道的整合.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1,2:41-44.
- [44] 陈力丹.深度报道“深”在哪儿?新闻与写作,2004,4:10-11.
- [45] 喻国明.深度报道:一种结构化的新闻操作方式.电视研究,1997,6:12-15.
- [46] 张洁.速度与深度:鱼和熊掌如何兼得?——论新媒体背景下的电视深度报道.中国记者,2011,3:45-47.
- [47] 董天策.民生新闻:中国特色的新闻传播范式.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7,6:88-95.
- [48] 朱寿桐.民生新闻概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 [49] 喻国明.从精确新闻到大数据新闻——关于大数据新闻的前世今生.青年记者,2014,36:43-44.
- [50] 刘保全.我国“精确新闻报道”发展综述.当代传播,2004,3:15-16.
- [51] 章永宏,黄琳.重建客观:中国大陆精确新闻报道研究.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3.
- [52] 王辰瑶.记者为什么成了不可爱的人?——兼论网络时代新闻生产者、使用者的“冲突”.新闻记者,2015,8:27-34.

- [53] 白红义,张志安.平衡速度与深度的“钻石模型”——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新闻生产策略.新闻实践,2010,6:29-31.
- [54] 栾轶玫.“众筹新闻”:新闻生产的新模式.新闻与写作,2014,2:27-31.
- [55] 韩鸿.论新媒体背景下的公民共享新闻学.新闻与传播研究,2006,3:73-79.
- [56] 王辰瑶.结构性制约:对网络时代日常新闻生产的考察.国际新闻界,2010,7:66-71.
- [57] 王辰瑶,喻贤璐.编辑部创新机制研究——以三份日报的“微新闻生产”为考察对象.新闻记者,2016,3:10-20.
- [58] 曾祥敏,曹楚.专业媒体新闻内容生产创新实践.现代传播,2015,11:34-41.
- [59] 方洁,颜冬.全球视野下的“数据新闻”:理念与实践.国际新闻界,2013,6:73-83.
- [60] 彭兰.社会化媒体、移动终端、大数据:影响新闻生产的新技术因素.新闻界,2012,16:3-8.
- [61] 郎劲松,杨海.数据新闻:大数据时代新闻可视化传播的创新路径.现代传播,2014,3:32-36.
- [62] 王村村,丁柏铨.数据新闻:价值与局限.编辑之友,2014,7:6-10.
- [63] 喻国明.大数据方法与新闻传播创新:从理论定义到操作路线.江淮论坛,2014,4:5-7.
- [64] 郭可,张军芳,潘霁.中美新闻传播学学术传统比较研究.新闻大学,2008,1:53-63.

Historic Intervention, Institutionalized Constraint and Multi-Dimensional Expansion: The Review and Thinking about Chinese Practice of Journalism Research in the Past One Hundred Years

Qiang Yuexin (Wuhan University)

Liu Lianlian (Anhu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Abstract: This paper tries to explore the inherent law of evolution which influences journalism business study, through describing the recent research progress and development trend of Chinese journalism research in 100 years from three dimensions including the environmental factors, news practice and discipline rules. At the beginning, Chinese journalism practice study motivated by the need of salvaging China from subjugation under the framework of westernized Chinese style had achieved historic intervention and had experienced the transition from the early experiential interpretation to the empirical generalizations in 1918. The research inherited the early Chinese communists' news practical philosophy and followed gradually the path of the institutionalized development after 1949, and this phenomenon of highly politicized research reached the acme during the Great Cultural Revolution.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Chinese journalism practice research influenced by the core of country's work transfer, market-oriented reform and accompanied by the return of the news-oriented concept, it gradually presents the trend of specialization and theorization and stepped into the multi-dimensional expansion stage.

Keywords: research of journalism practice; evolution; practical reflection; specialization; theorization

■收稿日期: 2018-02-11

■作者单位: 强月新, 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 湖北武汉 430072。

刘莲莲, 安徽省社会科学院; 安徽合肥 230051。

■责任编辑: 刘金波